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耿昇 李国庆

穿过 鸦片的硝烟

(哥伦比亚) 唐可·阿尔梅洛 著
郑柯军 译

*Viaje de Nueva
Granada a China
y de China a Francia*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穿过鸦片的硝烟

(哥伦比亚) 唐可·阿尔梅洛 著
郑柯军 译

*Viaje de Nueva
Granada a China
y de China a Francia*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鸦片的硝烟/(哥伦比亚)阿尔梅洛著;郑柯军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9

(亲历中国丛书)

ISBN 7-5013-2800-5

I.穿… II.①阿…②郑… III.游记—作品集—哥伦比亚—近代
IV.I77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829 号

书名 穿过鸦片的硝烟

著者 (哥伦比亚)阿尔梅洛 著

郑柯军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

版次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7-5013-2800-5/K·1202

定价 26.00 元

序

外国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海外汉学，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便是“游记汉学”，亦可称之为“记实汉学”（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考古报告）；其后发展为“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东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国人也不断来华，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不过，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入贡和从事贸易等，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

外国人的来华游记，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

外，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如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报告。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间谍”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继此之后，又有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 1215-1270年）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 1286-1331年）于1318-1328年出使中国，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出使中国，孟德高维诺（Jean de Mont-Corvin, 1247-1328年）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响者，非马可·波罗及其传世名著《寰宇记》（1298年）莫属。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死后发现了美洲。”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为寻找“契丹”和“日本国”，才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

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年)。他自1582年入华，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他留下的那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 (1615年)。在这个时代，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有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商人等，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他们所属的地区，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此时来华的外国人，除了为“朝贡”贸易之外，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中国依然为“天朝上国”，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

到了清朝后期，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来华人员更多，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一类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任人出入。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

面。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最新奇的是，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已经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或者就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出使报告、信件、游记、考察记、考古报告。他们的这些著作，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如宫廷斗争等）。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在清代，这些来华的外国人，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

素之外，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仰的心情，不远万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明者。心怀恶意者，确有其人；疑惑不解者，不乏其例；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

这些外国来华人士，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许多人来华之前，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任何历史资料，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观点、愿望的遗痕与色彩，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更何况那些洋人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20多年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他们

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过分担心。

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口述史学之类“活史学”的潮流，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种类繁杂、语种颇多、数量庞大，特别是难以觅寻。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但毕竟是沧海一粟，实难满足广大读者、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推出了一套《亲历中国》翻译丛书。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

《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

补不足之处。

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

在《亲历中国》丛书出版之际，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草书本序言，以表心意。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促进本国学术发展，能有裨益，做出贡献。

耿昇

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

译者前言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在加拉加斯的一所教会开办的医院里，我陪一位病人度过了两周，有幸“零距离”接触了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以及操持百业的善男信女。亲切的交往让我明白了这些友善的朋友们一个赤诚的信念：不信天主者，与兽类无异。

我这只兽类很受他们喜欢。我当时跃到未来，把中国计划在世纪末达到的成就当作现实描绘出来，博得虔诚服侍老天爷的信徒们由衷的惊叹。那时海外人士了解的中国，大概还需要他们继承先辈的遗志，拯救亿万万子民于愚顽贫寒之苦。

十几年后，我上次与外国道友们谈话的内容，已经成为举世皆知的现实。而我再一次去到南美洲，担任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跨世纪的文化参赞，与无数人打交道，获得了不少朋友，却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结识了一位上上个世纪的哥伦比亚人，尼古拉斯·唐可·阿尔梅洛。他是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踏访中国的先驱，与我们的老祖宗打过交道，待在中国的年头跟我在他老家履任的时间差不多。他

托这部书前来相见，以他的眼光和笔触，告诉我 150 年前他在中国的经历。

唐可出身显宦，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大概出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祖籍古巴，至其父辈移居现今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后家道衰落，多亏哥哥马利亚诺艰苦奋斗，竟然中兴。在兄长全力支持下唐可先后到美国和法国求学，后以经济学家身份回国从政。由于阅历肤浅，却口无遮拦，很快吃了诽谤罪官司而入狱。蒙亲友搭救出狱后，因惧怕随后可能的迫害，这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唐可逃往祖籍地避难，后又奉差遭到中国公干。唐可将一路见闻写成此书，在巴黎出版。

唐可的天主教狂热，在中国读者眼里很有些偏执的味道，却是那个时代欧美扩张者的典型情绪。早先的殖民者用宗教把殊死抵抗的印第安人变成了温顺的羊群，在美洲尝到了甜头的欧洲人，想在亚洲复制文治武功的历史。唐可描述的那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一般都小心翼翼，当时的情势不容他们特别张狂，因为其宗教的主体国家尚没有华夏取得特权地位。而且作为开路先锋，通常也不乏直白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只是唐可没有赶上主教大人恣意妄为的得意光景，因此对传教士的行动称誉有加。他把阿拉伯文化、佛教和中华文化都看作亚洲文明，直抒胸臆要用基督教予以改造，甚至取而代之。不过对于阿拉伯文明，唐可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了解，因为拉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他的殖民宗主国祖先，曾经与阿拉伯人紧密裹在一起足足 800 年，比中国与日本的那一

段 8 年的火热历史长了 100 倍。但是对中华文化，他只好昏眼旁观了：除了着他先鞭的马可那本近 600 年前的游记，他一点儿概念也没有。当他撞见中华文化的时候，新鲜、意外和震惊就是他最初的感受。

与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样，唐可·阿尔梅洛的书，也是一部旅行全程的游记。当初马可置生死于度外的动力是无利不起早，沿着发财致富的经商之道来华。而唐可来华的目的是什么呢？

近几年来，好些美洲国家特别是加勒比地区诸岛国里的华侨华裔人士，陆续举办纪念活动，庆祝华人移居该地一百又多少周年。实际上，华侨华裔在加勒比地区的起源，与唐可来华的这类使命，或者说买卖，有很大的关联。当时的古巴，制糖工业正位于世界的顶峰，甘蔗种植园莽莽苍苍，笼盖四野。黑奴吁天的哀号，化作晶莹的白糖让奴隶主赚得盆满钵满。正当对非洲劳动力需求的尖峰时刻，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英不列颠帝国将经营殖民统治的重点转向非洲，自然不能允许自立门户的北美洲再挖它的人力资源，而对它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中的对手西葡帝国所属的殖民地更加予以封锁。这个举措不但直接导致了新兴美国南北两方因对自身劳动力的争夺而开战，也使追随工业化道路的拉丁美洲陷入劳动力匮乏的困境。席卷欧美的工业化浪潮对全世界造成了第一次涌潮，自得其乐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即将被冲得七零八落，非 200 年功夫难以再见盛世。作为冲击的第一波，欧美强国强叩国门；第二波鸦片涌进；而第三波，即唐可乘风而来的大潮，就

是华工出洋，弥补黑奴的空缺。

历史上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实行的“契约华工”制，其实与印第安人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制一脉相承，并且是在世界大势新的阶段强势民族压迫奴役弱势民族的恶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已经腐朽垂死的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高压下不堪一击，加速了分崩离析的过程。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手工艺人和小买卖人失去生计，不得不靠为官僚买办资本甚至外国资本势力打工维生。有相当数量的人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反观美国，其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势头很足，国内产生了一股自西向东迅猛发展的潮流。经济的发展促使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之间的铁路干线。贸易的扩大对海洋运输的需求极度扩展，开挖巴拿马运河就成了事关世界经济格局的大事。自墨西哥以下的拉丁美洲经济也蒸蒸日上，生产规模迅猛扩大，而劳动力奇缺。印第安人逃过灭绝的命运已算幸运，早就没有多少价值可供榨取。而罪恶的黑奴贸易已经穷途末路，眼下根本满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自然把目光投向中国。此时已被坚船利炮撞开国门的中华帝国，就成了奴隶制劳动力新的来源。美国是始作俑者，而古巴则是该制度的先锋队成员之一。

唐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铁路赞不绝口。那时美国已经完成了两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铁路干线，如此，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让美帝国可以乘人之危调动兵力赶到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和其他条约的快捷通道，来自中国的契约华工“与有力焉”。那个时代

的古巴也曾是富甲一方的国度，此时它也要建造铁路了。古巴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已经得知中国劳力好使又便宜，自然动了这个脑筋。1847年首批200余名契约华工由西班牙宗主国的商船载运，经加利福尼亚来到古巴岛，掀开了华人在该地的血泪经历。尝到了甜头的资本家和种植园主日益贪婪地购买华人劳力。华奴的到岸价恒涨，招引得许多冒险家投身大潮，这中间就有雇用有国际经验的唐可到中国淘金的古巴公司。从书中涉及此事的寥寥文字看来，他任务完成得不错。一船又一船的华工，经他之手贩运到了加勒比海。这些中国人，与另外一些在美国幸存而转到古巴的华工，就是华人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起源。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被贩运到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逾30万人，而其中约一半进入到了古巴岛。

契约华工出洋的过程，有许多文献详述。历史的实情，一字以蔽之，“惨”！唐可算不了一位义人，却还算一个有同情心的青年。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办得有违良知，而且中方买办行事的方式大概很让他难受，以至愤恨。从他最后给中国人的禀性下的定义，可以想见他在生意活动中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都是些在商言商、见钱眼开、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的冷酷拐子手。中方采办人勾结洋商欺骗甚至劫夺男丁强行送往美洲的事实，史籍中记载无数。唐可对种植园残酷压榨黑奴的制度痛恨不已，对奴隶主的凶恶本性心知肚明，预感到被掠卖的华工将会在他的老家遭受非人的待遇，所以他一个字儿也不提自己贩卖苦役华工的经历，完全是因为内疚得很。

本书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的肤浅，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描述中国历史时，他仅凭道听途说就敢下笔逞能，勇气令人叹为观止。阿尔梅洛对英国人先靠快船走私鸦片后仗利炮强输毒品十分反感，直抒胸臆大加抨击，立场是站在正义一边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也没法指望西人从他的书里获得对中华的正确印象。

唐可原著用相当于白话文言的西班牙语写成。书中提到的人名、地名、事件，以及隐喻、借喻、典故，均照本译出；作者随情绪波动写景写人发议论，译者偶加注释，并未详评。

有几个基本问题，需稍作解释，以利读者理解。第一是哥伦比亚的货币比索。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比索看来抵得上一个美元。今天比索去换一个美元，差不多要 3000。平均每年贬值 20 块钱，150 年不间断。第二是新格拉纳达之所谓的由来。哥伦比亚是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之一，独立之际曾与现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共为一国。后该国解体，现地域改叫“新格拉纳达”共和国。此书 1862 年在巴黎出版时，恰值此历史阶段。分崩离析 30 年后国号又改回来。第三，唐可看来不像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叙述史实、列举人名地名、引用统计数据，往往不大清晰。

本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几位关键性人士。

阿拉榭丽女士，哥伦比亚前文化部长。如果没有她的建议，唐可今日还在故纸堆里打盹呢。格拉蒂丝·马丁内

斯女士，哥伦比亚共和国银行图书馆善本与手稿部资深研究员。她提供了原著，又找到一些历史资料，虽然稀少而且支离破碎，却勾勒出作者的性格，及时代的处境。该馆的馆长梅洛·冈萨雷斯先生，其聪明睿智，鸿儒风采，无不使人敬仰。他对中华文化的敬重溢于言表。他的支持，令译者后来动笔，虽苦犹甘。

我特别感谢玛利亚·维多利亚·德克鲁斯夫人，哥伦比亚共和国考卡山谷省卡利市文化促进会会长、豪尔赫·伊萨克斯（市政）剧院院长、卡利法文协会会长。她坚信本书可以作为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资料和一个见证，并且在文字理解、风土人情和美洲历史掌故等方面，给予笔者价值无可估量的指点。她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中国和哥伦比亚两国近些年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实际贡献。

唐可通过本书，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完全全地展示给读者看，直白而清晰。他在中国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将历史过程做了实况写真，使得本书具有了史料的价值。他的记叙、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也可以让中国读者明白中华文化映射在西方文化背景里是什么样子，从而从两方面产生反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反思。

2005年3月3日于北京真武庙。